

深度

浙江新闻名专栏

今年上半年，我市纺织品出口退货量明显增加，在看到国外技术壁垒，贸易保护措施日益严苛的同时，也需正视我市纺织品产业布局不均衡、生产制造低端化和应对国际竞争不力等不足——

纺织品外销需练好“内功”

本报记者 张正伟 通讯员 寇周闫

现状：“香饽饽”遭弃

针织产品一直是我市的重点出口产品，远销世界 100 余个国家和地区。但今年以来“风云”突变，我市纺织品出口频频受挫，增速放缓。据统计，1-6 月，宁波口岸出口纺织品退运 659 批，货值 3211.5 万美元，其中，产地在宁波的退运货值 279.1 万美元，同比增长 342.3%，占全省出口纺织品退运的 22.1%。

据统计，我市目前被退运的纺织品产地主要集中在鄞州地区，约占全部退运批次的 1/3，同比增长 220%， “这说明我市目前的纺织品产业布局不均衡，区域集中度高。”宁波检验检疫局相关工作人员分析道。此外，欧盟、日本和美国是我市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，同时也是今年上半年退运的主要发生地，退运批次分别占总量的 26.6%、22.4%和 10.3%， 同比分别增长 77.8%、160%和 100%。“出口市场多元化程度低、使得出口企业的市场抗冲击能力较差。”业内人士认为，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对我市纺织品出口产业敲响了警钟。

另据分析，我市虽然前 5 月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纺织品出口稳中有升，但新市场拓展仍隐忧重重。截至 6 月，宁波口岸纺织品退运涉及 24 个国家，其中，东南亚国家退运平均增速达 2 倍，越南由去年同期的 0 批次猛增至 50 批次。“东南亚国家具备人工、原材料等优势，正不断吸引纺织品企业向其转移，其中越南今年纺织品出口额有望达到 285 亿美元，成为第五大纺织品出口国，这将进一步挤压我市纺织品出口企业成长空间。”业内人士分析。



缘由：绕不开“拦路虎”

从被退运的情况分析，国外技术法规日趋苛刻是首要原因。据统计，上半年我市出口纺织品因质量不达标导致的退运逾九成。以欧盟为例，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于年初宣布重新审核 REACH 法规中四种邻苯二甲酸盐，严格限定其在人造革产品、服装和鞋类等合成产品中的含量。此类无害化生产要求，将迫使企业管理延伸到纺织原料和产品贮存运输等过程，因检测费用等导致的成本平均增幅将增加 1-2 倍。

34.5%左右，外出务工劳动力最低工资收入平均上涨 12.2%，而出口纺织品单价不升反降。

对策：苦练“内功”

据统计，我市出口退运纺织品主要为附加值低的 T 恤、背心、短裤和各类布料，占退运总量的 59.3%。象山出口纺织品企业 1000 家左右，但拥有自主品牌的不足 10%，80%的小微企业还处于纺织和缝制阶段，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容易遭受退运，且市场份额很容易被印度、土耳其等新兴场所替代。

面临环保、安全方面的要求提升，加之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，我市纺织品出口企业要打“翻身仗”，就要通过练好“内功”应对挑战。

首先企业要提高防范技术壁垒水平，建立完善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及快速反应机制，加强与国际接轨，强化对国际市场技术准入条件和出口商品技术竞争力的监测。“加强信息收集工作，积极跟踪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最新发展动态。”宁波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提醒相关企业，通过媒体、相关部门组织的座谈会和定制服务等方式，多途径获取信息，积极学习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功案例。

加强技术研发是重中之重。面对国际市场对产品质量的严苛要求，我市纺织品生产企业要改进产品生产工艺，培育新的竞争优势。大企业要发挥龙头作用，通过规模化、品牌化发展，依靠品牌拓展市场，实现差异化转型发展，小企业要联合大企业创牌，实现整体转型跨越。

此外，相关企业要关注市场动态，尽量避免因输出国政策法规变化、市场波动导致损失，同时，积极开拓新市场，增强风险防范能力。



日前，经中共中央批准，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、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。经查，仇和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，收受礼金、礼品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在干部选拔任用、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收受巨额贿赂。其中，受贿问题涉嫌犯罪（7月31日新华社电）。

仇和，曾经是一个“符号”，人们用以探讨民主与效率、强权和公正之间矛盾关系的隐喻。他在江苏宿迁工作的时候，宁波市委组织部曾派人去学习考察，干部公示制

“仇和现象”值得反思

□范 昉

最早就是仇和在宿迁提出并实行的，不久就在宁波落地生根。对于仇和，笔者起初是“挺”他的，理由很实在：他所到的地方，经济都在进位；他离开的地方，经济却在退位。当时许多一线的市场领导者，抛开有关仇和的争议，把他的施政理念与风格运用在了自己的工作实践中，河南长垣县甚至发动了一场“一学三做”（学仇和，真情做人、正气做官、大胆做事）的大讨论。

当时对“仇和现象”最大的争议是，仇和试图“用人治来推动法治，用不民主来推动民主”的方式是可行的吗？对此，笔者当初的态度也很务实：宿迁很贫穷，要想在

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，只能是“压缩饼干式”的发展，需要采取“外部强制推进”的方式，也就是依赖“一把手”不惜以人治和不民主的方式强制推进。笔者认为，在当时法治和民主还不很完备的情况下，这样做有一定的合理性，而且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。

笔者长期从事党建研究工作，剖析了许多“一把手”权力失控的案例，逐渐意识到“一把手”权力过于集中是严重的制度缺陷。“一把手”只是对党政正职的一种通俗化称呼，但很多人理解为权力的集中，权力不受制约。从制度意义上说，党内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“一把手”。以用人来说，党内并没

有个人用人权，用人权属于一级党委，任何个人只有平等一票。“一把手”的权力必须收敛，必须设定边界。据此，笔者开始反思“仇和现象”，意识到任何试图“用人治来推动法治，用不民主来推动民主”的方式，都是对现有制度的戏弄，是在开历史的倒车，其危害程度远远超过它的正面作用。

有学者将“仇和现象”概括为“强人政治”，是有道理的。应该理性对待“强人政治家”，就像当年英国人对待丘吉尔一样，虽然英国人民对他领导反法西斯战争持很高评价，但不再让他连任首相，因为害怕他的专制权力。就国内政治生态来看，我们也不难发现，大量“一把手”落马，与权力不受制

约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。正如中纪委决定所指出的：“仇和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，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，严重违纪违法，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、不收手，性质恶劣，情节严重。”这种无视约束、不知收敛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。

仇和落马，宣告了“仇和现象”的终结。仇和，不再是一种“符号”，“仇和现象”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。但“仇和现象”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，一些人也曾为之迷惑，因此，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，是必要的、值得的。对于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来说，应该通过对“仇和现象”的反思，引以为戒，不是被动地、而是自觉地走进“制度的笼子”中去。

“电梯吃人”的漏洞需要尽快堵上

□毛雨皓

7月26日，湖北荆州一商场手扶电梯发生事故，一女子被卷入电梯内不幸遇难；7月27日，广西梧州一幼儿手臂被自动扶梯卡住，左臂重伤致残；7月30日，杭州一部住宅电梯发生事故，一大三女生不幸身亡。频发的“电梯吃人”事故，暴露了电梯使用中的种种隐患和漏洞，让人一时间谈“梯”色变。

就我们宁波来说，现有各类电梯 6.5 万台，在用的有 6 万余台。目前恰逢基层质监局机构改革、监管队伍职能整合，新的电梯监管模式尚未完全建立，设备数量迅速增加和基层监管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。同时，由于“电梯关人”“电梯吃人”有很大偶然性，少数监管人员存有侥幸心理。这就亟需加强监管力量，提高监管意识。

商场、车站等公共场所的电梯、人行扶梯的使用者多是顾客，他们对电梯的安全情况缺乏了解，而产权人对电梯运行中的瞬时信息也很难及时掌握，导致电梯使用中的信息双向盲区。住宅、写字楼的电梯产权属于全体业主，由于产权人过于分散，一般委托物业公司管理。而物业公司受制于业主委员会，往往不能及时使用专项资金，导致电梯维修不及时或不到位。在电梯的使用过程中，一些不文明习惯屡见不鲜，比如，扶手电梯上孩子逆向奔跑，野蛮的搬家行为损害

电梯轿厢……这就亟需厘清各方权责，规范使用习惯。

从维修方面看，电梯维护保养行业竞争激烈，老旧电梯改造艰难。我市电梯维修保养单位有 100 余家，有些单位维保服务并不到位，仅仅靠低价（有的已低于成本价）来吸引客户，检修保养敷衍了事不说，甚至出现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情况。目前，我市有 1100 余台老旧电梯已经或即将进入“衰老期”，需要更换或全面维修，但做起来并不容易。一方面，我国尚没有出台电梯整梯的报废标准，也没有哪一部法律明确规定电梯的使用年限，加上由于维护保养和使用频率等不同，对老旧电梯是更换还是维修往往存在意见分歧；另一方面，老旧电梯改造需要大量资金，资金来源各方的意见也很难统一。这使得好多早已“老态龙钟”的电梯，还在“超龄服役”。

随着高楼越来越多，商场越建越多，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电梯时代，但与之对应的是，公众的安全意识并未提高多少，电梯的生产厂家和维护机构缺乏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，监管部门更是时常失语乃至缺位。接二连三发生“电梯吃人”事故，骇人听闻，是该好好反思、检讨一番，尽快完善法律制度 and 监管体系，堵上一个个漏洞。



意思意思

刘志永 绘

维权过度就是敲诈勒索？

□马涤明

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男子李海峰购买了 4 包今麦郎（日清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方便面，发现其中有“异物”，向今麦郎公司索赔 450 万元。随后，今麦郎向公安机关报案，7 月 29 日晚，李海峰被绥化市警方以敲诈勒索罪刑拘（8 月 1 日《重庆晨报》）。

消费者索赔，被认定涉嫌敲诈勒索，笔者认为严重背离法律常识。刑法规定的敲诈勒索，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使用威胁和要挟的方法，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。而本案是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

抓捕另一方的情况，每每受到舆论与法律界的质疑。这种情况多起来，大企业岂不是成了“老虎屁股”，没人敢摸？

2006 年，大学生黄静因华硕笔记本电脑质量问题，向厂家索赔 500 万美元，厂家报案后黄静被警方羁押 295 天，后检方出具刑事赔偿书确认：“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以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赔，并不是一种侵权行为，反而是一种维权行为，所要 500 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。”今天的今麦郎案与黄静案基本相同，消费者“狮子大开口”确有不妥，但与“敲诈勒索”不沾边。如果维权过度，便可能踏进“敲诈”的陷阱，以后谁还敢维权、监督商家？这绝不利于市场环境健康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。

可惜的是，不管公众信不信，相关决策者显然是信了。不久前公开征求意见的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修订稿，完全废弃了“收费公路收费期限届满，必须终止收费”的旧法核心条款，改为先让企业收费 30 年，再让政府“统借统还”收费 N 年，最后以养护管理收费的名义永远收费下去。这一改变，其中一个核心依据就是收费公路的连年巨亏。如果收费公路呈现出来的是暴利数据，收费期限就没有理由延长，更没有理由长期收费下去。于是问题来了：全国收费公路巨亏数据真经得起检验吗？既然广东可以变“巨亏”为“暴利”，其他地方是否也可以？要辨别收费公路巨亏数据是否存在“统计的艺术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所有巨亏的项目进行专项审计，看看它们的运营管理支出是否存在虚报，看看它们的工程建设成本是否多计，看看它们的招标投标腐败成本是否同样沉重，看看它们的“小金库”在三令五申下是否还在金光闪闪……这是公众理应享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。

一边是交通部门频频晒出巨亏账本，拟延长收费年限；一边却有广东高速在审计中被查出超过 12 亿元的漏洞。广东省审计厅厅长何丽娟透露，通过对高速公路项目竣工决算审计，发现建设单位多计工程建设成本 9.06 亿元。此外，还发现单项合同超过规定限额未经招标、项目建设单位违规设立“小金库”等问题（8 月 2 日《每日经济新闻》）。

今年 6 月份，广东省交通厅先后两次公布了去年全省收费公路统计情况，从巨亏 28.8 亿元神奇地“扭亏为盈”为盈利 3.9 亿元。数据的“反转”，主要是因为运营管理支出从 106 亿元“缩水”成了 72.9 亿元。如今，广东省审计厅进一步给广东收费公路数据“挤水”，而且一“挤”就是 12 亿元。这还只是高速公路的部分，如果对所有的收费公路进行审计，可以挤出的“水分”也许还要更多。

从广东的情况来看，收费公路要想“扭亏为盈”其实并不难，无非挤掉腐败水分，戳穿“巨亏”谎言而已。那么，全国的情况又如何呢？交通部不久前公布了去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，巨亏 1571.1 亿，比 2013 年度亏损 661 亿元翻了一倍还多。不知道这份巨亏公报里，广东的数据是如何被计入的？其他省份的巨亏数字，又有多少经得起审计？

一个基本常识是，如果收费公路的确存在巨亏，必然要有人来理单。可现在，统计公报中的数字惨兮兮，相关路桥企业却表现得非常淡定，不仅高管依旧拿着高薪，也没听过老板跑路或者员工发不出工资的新闻。更奇怪的是，在亏损数据一年翻一倍的大环境下，A 股上市路桥企业竟没一家因为亏损戴上 ST 的帽子。巨亏数字没能产生“后果”，相反却有魔术般“变巨亏为暴利”的“奇迹”，公众当然有理由怀疑，巨亏数据没有说服力，且不能排除数据造假的可能。

可惜的是，不管公众信不信，相关决策者显然是信了。不久前公开征求意见的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修订稿，完全废弃了“收费公路收费期限届满，必须终止收费”的旧法核心条款，改为先让企业收费 30 年，再让政府“统借统还”收费 N 年，最后以养护管理收费的名义永远收费下去。这一改变，其中一个核心依据就是收费公路的连年巨亏。如果收费公路呈现出来的是暴利数据，收费期限就没有理由延长，更没有理由长期收费下去。于是问题来了：全国收费公路巨亏数据真经得起检验吗？既然广东可以变“巨亏”为“暴利”，其他地方是否也可以？要辨别收费公路巨亏数据是否存在“统计的艺术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所有巨亏的项目进行专项审计，看看它们的运营管理支出是否存在虚报，看看它们的工程建设成本是否多计，看看它们的招标投标腐败成本是否同样沉重，看看它们的“小金库”在三令五申下是否还在金光闪闪……这是公众理应享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。

『巨亏』的收费公路都应该被专项审计

□舒圣祥